



# 朱元璋南征之谜与屯堡文化

□朱光文

安顺屯堡文化是明朝朱元璋南征留守军队自我封闭传承的结果。朱元璋南征北战,每打下一个地方,就要把一部分军队留成屯堡之地以巩固政权,安顺也不例外。有意思的是,六百年过去了,偏偏只有安顺这个地方的屯堡人固守和传承着明代社会文化生活习俗,这其中的奥秘,无论从屯堡文化研究的角度还是史学研究的视角,都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最近,笔者受朋友之托查阅相关资料,发现朱元璋南征后留下了三个令人费解之谜,正是这三个费解之谜在客观上导致了安顺屯堡文化的固守和传承。

所谓朱元璋南征的三个谜团,简言之就是我们认为不好理解的三个问题,即:朱元璋1368年称帝定都南京改元洪武,其后两三年内平定中原,江山基本稳定,为什么不及早征讨云南,而要在洪武十四年(1382)才对云南用兵?这是其一。其二,当时云南已在巴蜀、湖广的包围之中,虽然可通过西藏与北元联系,但是,元帝败北已自顾不暇,云南梁王已属残余,朱元璋只需一、二十万精锐部队即可拿下,为什么不顾成本,非要派三十万大军征讨?其三,付友德率三十万大军于洪武十四年九月征讨云南,十二月即平,仅百余天的时间,可谓摧枯拉朽,以博象之力博虎,其功劳应不是太大,如论功行赏的话,最多也只能是发点奖金,可是,朱元璋为什么晋封付友德为颖国公?这三个问题的确不好理解,因为正史没有明说,也没有看到有说法的野史,所以,我们只能根据相关资料作推测。

我们先来分析朱元璋为什么既不在早,也不在晚,偏偏要在建立大明朝后的十四年才用兵征云南的问题。兵家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说法,所以,朱元璋征讨云南当然是以兵威说服为上上之策。因此,朱元璋于洪武六年、洪武七年分别派使臣王祚、吴云到云南说服梁王归顺朝廷。这两次赴滇之行,不仅未果,更让朱元璋不能容忍的是梁王居然杀使臣王祚于云南,吴云亦被杀于去往云南的路上沙塘口(大约在广西南南的交界处,当时属云南)。按理,当时朱元璋就应该大举兴兵征讨云南,正如他所说:“今元之遗孽把匝刺瓦儿密等自恃险远,辄害使臣,在所必讨”(《明史纪事本末》)。既是在“在所必讨”,为什么不立即征讨,却要等到洪武十四年才讨?笔者认为,并非朱元璋不想及早用兵,也不是朱元璋缺乏兵员粮草,根本的原

因是讨云南易,管云南难。朱元璋还没有想好一旦打下云南后,该怎样控制管理云南的办法。云南的特点是险、远,如果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管理办法,攻打云南势必会形成朝廷打过去他投降,官军撤走他反叛的拉锯战,这不是朱元璋愿意看到的结果。当然,派大将驻守也可(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朱元璋采取的是派大将沐英驻守),但是,古往今来,大臣拥兵自重,据险谋反的事并不鲜见,尤其是明初移民屯田,朱元璋本以汉徙富民实关中制,所以,对汉初韩信曾以“代齐王”要挟刘邦等诸事值得警惕的相关历史事件他不会不清楚。因此,派大臣驻守云南,在朱元璋看来,应该还有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那就是镇守云南的兵力应该是多少。少了怕控制不住北元残余势力和当地众多的少数民族部落;派重兵把守吧,又怕镇守大臣一旦拥兵谋反,后果更不堪设想。更让朱元璋伤透脑筋的是,担心和防范镇守大臣的谋反只能阴在心里谋算,不能说出口,因为,无论派谁镇守云南,你总不能一方面说信任别人,一方面又公开防范别人吧?这样无疑就是要把别人逼到谋反路上。因此,朱元璋在未拿定这个主意之前,他是绝对不会出兵征讨云南的。这就是朱元璋即使在使臣被杀之后,也只能隐忍,不能用事的根本原因;反过来说,朱元璋之所以在立朝后的洪武十四年征讨云南,就是他已想出万全之策的时候。

朱元璋想出的这个万全之策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就是派沐英世代镇守。因为沐英是朱元璋的干儿子,比较信得过,但是历史的经验,亲儿子都未必靠得住,干儿子更要防着点,怎样防?安顺是通往云南的咽喉,中间隔着险峻的关家岭,交通不方便,朱元璋就是利用这个有利地形,在安顺屯积大量军队,既把沐英堵在云南,又不能相互联系。按照这样的安排,如果沐英真的一旦谋反,不仅他出不了云南,不会影响江山社稷,而且,朝廷征讨也因为安顺这个基地,无论是时间上、兵员上、粮草供给上都会占据很大优势,确保能及时解决问题,平定叛乱。朱元璋的这一心理盘算,可从其发兵之前,给付友德的密函窥知一二:“尔等行师之际,当知其山川形势,以窥进取。朕尝览舆图,咨询于尔,得其扼塞”(《明史纪事本末》)。朱元璋还要付友德“选行川、蜀、雅、播之境,修城郭,缮关梁,因兵威降金筑(今贵阳)、普定(今安顺)诸山寨”(《明史》)。由于打下云南后须防备镇守云南的大将谋反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事,

所以,他只能通过强调地形环境来传达其真实的思想。

由于朱元璋已有屯军于安顺钳制云南的准备,所以,不惜劳师动众以三十万大军征云南,就不难理解了。付友德是跟随朱元璋多年,出生入死打天下的心腹爱将,对朱元璋的心里顾忌、弦外之音自然能心领神会,我们认为这正是付友德征云南的真正立大功之处。付友德到底是怎样来领会贯彻朱元璋的真实意图的呢。付友德率大军于洪武十四年九月从南京龙江出发,十二月克普定,十六年三月,朱元璋命耿炳文往谕付友德、蓝玉等班师,而副将军沐英以数万众留填云南镇守。十七年三月,付友德班师回朝。从十四年九月至十七年三月,付友德在征南期间,真正用于讨元梁王的时间不过数十天,用兵不过数万,而大部分时间都是活动于贵州毕节、安顺一带,征讨各地少数民族部落。并借此对贵州地理环境进行深入了解,以寻找屯兵钳制云南的有利地形环境,这从朱元璋的班师令和付友德的屯兵部署可以看出端倪。洪武十五年八月,朱元璋遣使谕付友德、沐英:“云南士卒既艰食,不宜分屯。止于赤水、毕节、七星关各置一卫;黑张之南,瓦店之北,中置一卫。如此分守,则云南道路,往无碍矣。霁翠之地,必用十万众乃可定也。凡此者,朕所亲见大概耳。万里之外,岂能周知,将军便宜处置”(《明史纪事本末》)。霁翠是谁,知道的人不多,但是奢香夫人知道的人则不少。霁翠就是奢香夫人的丈夫。我们知道,奢香夫人的墓葬在毕节大方县,也就是说,霁翠的势力范围主要应在毕节的黔西、大方、威宁一带,且据正史记载,洪武十四年,霁翠已死,由其妻奢香代奏。十七年,奢香率所属到朝廷,帝赐香锦绮、珠翠、如意冠、金环、锦衣。洪武二十九年,奢香死,朝廷遣使祭之,其子安的贡马谢恩。史料说明,奢香的势力一直是归顺朝廷的,并无必要屯十万之众以防其变,即便要屯,也应屯于毕节之境,但是付友德屯“霁翠之地,必用十万众”却把军队屯于安顺境内。这不明显摆着不是钳制云南又是什么呢?从朱元璋传谕的字里行间也不难看出,对云南的防范虽是轻描淡写,其实那是要给沐英看,表明对沐英镇守云南的信任。而以十万之众防霁翠,实质上就是要付友德领会其真正用意是钳制云南于万一。因为,毕节紧靠巴蜀边界,亦无险可守,只需于赤水、毕节、七星关各置一卫足矣,不须十万之众。付友德留下了一份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

下班师令,时隔一年,洪武十七年三月,付友德才真正起身班师,在这一年的时间,付友德在贵州做了什么,野史、正史都没有详细记载。但我们不禁要问,付友德在贵州既无事可做,又不遵旨及时班师,一年的时间到底闷在贵州做什么?唯一的解释就是,付友德要按照朱元璋的意图对云南进行钳制,精心进行兵力部署。从今安顺屯堡村寨的分布情况来看,安顺平坝、西秀区比较集中,安顺以西则向南北两面逐步散开,对云南东来之必经关家岭形成包围圈,符合军事部署要诀。这应该不会巧合。当然,付友德对十万大军做如是部署,是心照不宣的事,史籍自然不好记载。但是,付友德论平云南功劳而晋为颖国公,应该说以此不会没有关系。再则,从《明史·付友德传》所记,付友德在洪武十七年后再次为征南将军,率师在云贵一代征讨诸多少数民族部落反叛,并未动用屯于安顺之十万大军,足以说明这一点。

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沐英世代镇守云南与明朝相始终。正因为如此,屯于安顺的十万大军,才得以在安顺这块土地上休养生息,逐步由兵演变成民。据《明史》记载,弘治四年,贵州编户为四万三千三百六十七户,人口为二十五万八千六百九十三口。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这意味着这二十五万八千六百九十三口人里有至少一半是洪武时期十万明军的后代,而且这些人也都集中在以安顺为中心,方圆几十公里的地方。由于明初的十万大军屯集安顺之时,其主旨是备军务钳制云南,他们与一般的屯军屯粮有明显的区别,所以,他们尽管管住得相对分散,但他们是一个大的军营整体,对外具有相当的封闭性,因此就必然形成共同的生活和文化习俗,随着历史的演变发展,他们逐渐由兵演变成民,但是他们在安顺已处于绝对的文化强势群体,加之这里与中原又因交通阻隔,信息不通,因此,他们共同的生活和文化习俗,既不会受当地土著文化的同化,也不会受中原文化的干扰。这也就是安顺屯堡文化六百年自我传承固守不变的真谛所在了。以军屯地戏为显著特征的文化习俗传承在这里也才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总之,立屯堡,候征讨,是朱元璋针对少数民族地区一个十分明确的战略指导思想,把这一战略指导思想用于钳制云南,而在安顺形成了六百年固守不变的明代遗风——安顺屯堡文化,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

## 中国版本图书馆 收藏各类出版物版本近400万种

中国版本图书馆日前共收藏各类出版物版本近400万种,每年新增馆藏图书版本17万种(册),期刊合订本1.3万种,报纸合订本3000种,音像制品及电子出版物达1万余种。目前,中国版本图书馆已发展成为当代中国最完整、最权威的出版物版本收藏库和出版物信息资源库,为新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中国版本图书馆馆长左晓光介绍,中国版本图书馆目前将书号实名申领、条码制作、在版编目、样本收藏保管、版本研究利用、编辑出版《全国新书目》等工作放在统一业务平台上,形成关于出版物标识和版本信息管理的业务链条。

## 国内首个文化产业信贷产品在浙推出

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推出专门针对浙江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入区企业的融资信贷产品“影视通宝”。作为我国首个针对文化产业的信贷产品,“影视通宝”为我国文化产业破解“融资难”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目前,我国影视文化产业发展迅速,但由于国内缺乏对版权价值认定、评估体系,影视企业可抵押的固定资产很少,融资成了影视产业发展的最大瓶颈。为此,浙江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联合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东阳支行通过深入调研,推出专门针对实验区入区影视企业的“影视通宝”。据悉,该产品可采取房地产抵押、保证、应收账款质押、版权质押等担保方式进行贷款。

首家接受授信融资的浙江东阳唐德影视制作有限公司,是一家在电视剧制作领域有较强实力的企业。但由于销售回款较慢、制片预付较多,企业资金紧张,制约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该公司多次申请银行贷款,但由于自身固定资产较少、难以落实有效担保而未果。

“影视通宝”面市后,公司以《永不消逝的电波》等6部电视剧作品的应收账款和《金大班》等5部热播电视剧作品的版权为质押,从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获得了3900多万元的授信融资。

浙江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管委会办公室主任厉红亮介绍,“影视通宝”的面市,对实验区的发展意义非常重大。它不仅使实验区在招商上形成了金融新优势,也为全国文化产业破解“融资难”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 文化部出台《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管理办法(试行)》

为规范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的申报、命名和监督管理工作,文化部日前出台《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管理办法(试行)》。

办法分为总则、申报与命名、管理和考核、附则等四章22条。办法由文化部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办法指出,所称园区是指进行文化产业资源开发、文化企业和行业集聚及相关产业链集聚,对区域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起示范、带动作用,发挥园区的经济、社会效益的特定区域。园区建设应遵循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突出特色、内容优先、自主创新的原则。

办法明确,文化部负责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的申报、命名、管理和考核。省级文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省级的文化产业园区的申报、命名、管理和考核,并负责对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的指导和监管。园区每两年申报、命名一次,每次命名不超过两个。原则上每个省级行政区内园区总量不超过两个。园区每两年考核一次。

办法要求,申报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应具备九个条件:一是符合国家文化产业规划,当地总体规划和发展规划,在土地、消防、安全、节能、环保、卫生等方面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和规定;二是具有完善的基础设施,能够充分利用区域优势,为文化企业发展提供必要的硬件环境。园区内非文化类商业及其他配套设施不得超过园区总建筑面积的20%;三是具有丰富的文化内容和明确的文化产业特色,成绩显著,在全国或本省及区域内具有代表性和示范性;四是已经集聚了一定数量的文化企业,园区内文化企业数量占园区企业总数的60%以上。园区内文化产业产值、交易额等经济效益指标居于国内领先地位。园区内文化企业所生产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提供的文化服务内容健康;五是具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管理制度健全,没有发生违法违规行为;六是配有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能够为进入园区的企业提供企业孵化、融资中介、技术、信息、交易、展示等公共服务;七是建设和运营单位是法人单位;八是规范运营两年以上,且经济和社会效益业绩显著。九是法律法规确定的其他条件。

据新华社

# 卢朝阳和他的《风水宝地》

□宋茨林

(一)

卢朝阳的长篇小说《风水宝地》终于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据说,因为种种不便言说的缘故,出版时对原告做了大量删削,只留下14万字,殊为可惜。但是,我认为朝阳还是应该感到欣慰的,因为有名家为他捧场:戴明贤先生为他题写书名,并绪东先生为他撰写序言。

但卢朝阳似乎没有显出特别高兴的样子。20年前他曾制订了一个庞大的写作计划,发誓要写一部百万字的《山韵》!《山韵》分为“三部曲”——《风水宝地》、《山之脊》、《山祭》,这是一个要造就大作家的大计划。

14万字的《风水宝地》的出版,与这个大计划的完成相距甚远,而卢朝阳已年过花甲。在花甲寿诞时,他给自己撰写了一幅对联:

笔耕四十年,披肝沥胆疏因果;  
笔活六十岁,晃打忽兮竟花甲,

这是自嘲自讽之词,也是烈士暮年的悲怆。选择文学之路,朝阳悔也不悔?人生歧路,选择艰难,甚至痛苦,因此,古代哲人杨朱曾有“临路而泣”的著名故事留与后人。朝阳当然知道这个故事。

(二)

我知道朝阳其人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那时,他是国营安吉铸造厂的工会干部,好像刚从军队转业到地方;我是原安顺县蔡官区医院的一个小小医士。由我们医院步行到安吉厂只有十分钟的路程。冬日的一天,我在田野里看见一辆三轮摩托车在公路上疾驰而过,绝尘而去,驾车的人身穿军大衣,竖起毛领子,戴着皮手套,架着太阳镜,留着络腮胡,高大而威猛,酷似电影里的特战士兵。后来我得知,那就是卢朝阳,是国营大企业的小秀才,已经在党报上发表过不少文章了。后来,他调到了飞机设计所,不知任何原因;再后来,他调回了他的家乡镇宁自治县,当了文化部门的小官,他退休前曾任镇宁文联主席,而现在,是一个比他老的老头,远离繁华与是非,淡然地听潮起潮落,悠然地看云卷云飞。

卢朝阳是布依族,出身成份好,曾在滇西从军,很早就入党,有文化,有文

才,本来是一个“好官材”,要当官可以高升,要下海定能致富。但他偏偏选择了甘寂寞、自我折磨乃至自我放逐的文学创作之路。他之回到镇宁,并非为了做官,而是要回到他的生活基地,以便就地取材、潜心创作,以实现他的作家之梦。

这样,我和朝阳这只迷途羔羊终于在文学之路上相识相知而成为朋友——我们曾酸溜溜地互称为“文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与朝阳曾数次同时在某些文学杂志社举办的改稿会上相逢,为发表作品而努力而欣喜。

但我终究为朝阳感到惋惜。我的政治秉赋、经商头脑和家庭条件均不如他,我不是“治国平天下”的材料。我之选择学医和习文,实在是出于无奈。而朝阳,本应登上指点江山的舞台,即便是涉及文墨,也该在中流击水,在马背吟哦,在风口浪尖唱“大风歌”,不须满足于“自留地”里的小花小朵。须知,轰轰烈烈的八十年代,为聪明而又强悍的卢朝阳提供了多少建功立业的好机会呀!

(三)

古今欲成大事者,断不会去会“作家梦”的罢?但朝阳做了,他的一生就是一个梦,就是一部长篇小说,他的性格,决定了这部长篇的情节,也决定了主人公的命运——一种宿命!

研习文学,必沾染文人习气;做“作家梦”,一心想鸿鹄将至;对于实务,必有大妨。“要当作家”的“妄念”,不知误了多少可做大事的年轻人!

但朝阳不算被误。他孩子般诚实做梦,绝不借文学之名招摇过市;他农夫般辛苦耕耘,绝不以文人身混迹官场。他好歹成了作家,过去发表过许多作品,现在在《风水宝地》赠与我们。

关于《风水宝地》的主要内容和艺术特点,并绪东先生在“序言”里已经作了中肯的概括。并先生是贵州省文联常务副主席,是领导,并先生又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是权威。关于《风水宝地》的价值,我无需再费脑子,只需引述并先生的看法就行了——

“这部洋洋洒洒几十万字的小说,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作家通过清末民初鸦片毒品毁了鲁家大院几代人的历史故事,反映了贵州人民在封建社会到新的社会诞生这个过程中所经

历的痛苦。”

“作者以生动的笔触,精心描绘了那个时代中官绅人家和寻常百姓的生活形态,包括人际交往、衣食住行、婚嫁嫁娶和民间节庆等民风民俗,丰富而精到,宛如那个时代黔中生活的百科全书。”

“历史离我们如此之远,当年的社会生活形态早已荡然无存,作者要在自己的笔下栩栩如生地再为我们道来,没有一个广泛猎取、深入捕捉的过程,没有一个对所涉文化资源长期咀嚼与深刻领悟的功夫,作者是不可能展示出如此生动的生活画面来的。”

并先生认为,《风水宝地》具有“较大的生活容量”和“相当的历史深度”。

并先生的分析,不但引导我去认识《风水宝地》的文学价值和艺术特点,而且深化了我对朝阳兄的认知。却原来,朝阳的文学追求并非只是流于虚无飘渺的浪漫幻想,而是贯穿于踏实挖掘的践行过程。他从山乡到军营,从军营到国企,然后又从国企回到山乡,始终奔向自己的既定目标,奔向那个令他魂牵梦绕的《山韵》三部曲。面对繁华的城市,他选择了古朴的山乡;面对现时的召唤,他选择了远去的历史;面对官场和商场的诱惑,他选择了带有悲剧色彩的自我放逐!仿佛有一个神秘的声音在呼唤他:拿起你手中的笔,书写黔中的那段历史,展现瀑乡的奇特文化!

然而,在朝阳兄的瑰丽梦境中似乎出现了令他惊悚的魔影。他在“后记”中写道:“这是二十年前我拟定的《山韵》三部曲《风水宝地》、《山之脊》、《山祭》写作计划的第一部,勉强将两部书初稿脱稿,我就从命运的浪峰滑入谷底,始悟出人生的凶险。”

年届花甲“始悟出人生的凶险”?天真,是他的幸福;迟悟,是他的不幸!“艰难困苦”,真的能够“玉汝于成”吗?

创作需要“燃烧”,乃至需要“变态”,平庸的精神状态是绝不可能产生奇异的精神花朵的!这样,写作者便会在激烈的现实矛盾和复杂的人际关系中难以左右逢源。何况,在付出毕生精力之后,只能以“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聊以自慰,及至晚年,梦境凄清,这是文学创作的危险,也是绝大多数耗尽心血者的悲剧!

然而,正是无数“悲剧性的追求”,

书写了文学史,书写了人类的精神文明史!

(四)

我突然想到,朝阳的“风水宝地”,其实就是他的“文学领地”。小说中人物活动的“基地”,就是朝阳的家乡镇宁,书中写到的“正丰”,其实就是本人的家乡“贞丰”,而“安定府”其实就是昔日的安顺,至于“省城”,无疑就是“贵阳”了。从这片“风水宝地”,人物活动放射到滇、川和两广;“黔之腹,滇之喉,蜀粤之唇齿”——书中写到的鸦片贸易尤其证实了这片“风水宝地”的独特地位。

这片土地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和土壤特征,都十分适合种植罂粟。在朝阳的笔下,在这片土地上,满山遍野曾经盛开着罂粟花——一种美丽得令人心惊肉跳的罪恶之花!

堪舆之学,古已有之,风水文化,源远流长。古有王充对“风水”的诘难,有嵇康对“诘难者”的再诘难,有刘伯温看风水定天下的各种传说;今有学者高有廉的学术解读,有香港著名“风水师”的精彩故事……

朝阳在风水之学上是下过功夫的,他曾经与我谈过在镇宁一地或因风水兴或因风水衰的许多有趣故事,还分析过风水之学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以及环境保护的关系。

但朝阳的笔触重点不在风水而在世道人心。在罪恶的社会制度下,“风水”再好,“宝地”焉在?

于是,朝阳在《风水宝地》的结尾留下了充满善心的理想之笔——他让因鸦片贸易获得巨额财富的梁天佑悟出了一个道理:“没有人,找钱做什么?”朝阳写道:“良久,梁天佑咬紧牙关,做出一个惊人的抉择。一年后,梁天佑在安定和外地的所有商号全部关张。镇宁县新办了两所私立学校——梁家小学和梁家中学。”

这样,作家为我们留下了“三部曲”中第二部的伏笔:社会的进步和科教の兴起将为“风水宝地”培育出“山的脊梁”。

朝阳还会再写下去吗?他会因为“从命运的浪峰滑入谷底”吗?他一蹶不振而搁下手中之笔吗?他会辜负养育他的这片“风水宝地”吗?他会让他的“文学领地”就此荒芜吗?

朝阳老矣?尚能饭否?

